



南洋史地與華僑華人研究

— 李長傅先生論文選集

李長傅等 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

南洋史地與華僑華人研究

——李長傅先生論文選集

暨南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南洋史地與華僑華人研究/李長傅等著 .一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1.5

ISBN 7-81029-585-3

I. 南… II. 李… III. ①歷史地理—研究—東南亞—文集
②華僑—研究—東南亞—文集 ③華人—研究—東南亞—文集
IV. ①K933.6-53 ②D634.33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17168 號

出版發行：暨南大學出版社（廣州·石牌）

地 址：中國廣州暨南大學 510630

電 話：編輯部 (8620) 85225262/85220289/85225277

發行部 (8620) 85223774/85225284/85220602（郵購）

傳 真：(8620) 85221583（辦公室）/85223774（發行部）

排 版：暨南大學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湖南省地質測繪印刷廠

印 張：17.5

字 數：434 千

規 格：850×1168 1/32

版 次：200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平裝 1800 冊 精裝 200 冊

定 價：平裝：28.80 元 精裝：38.0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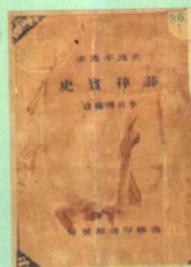
出版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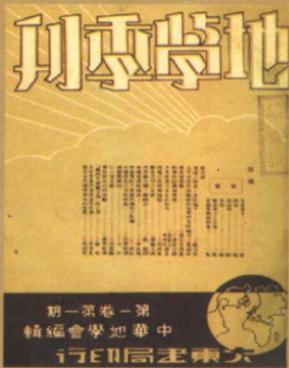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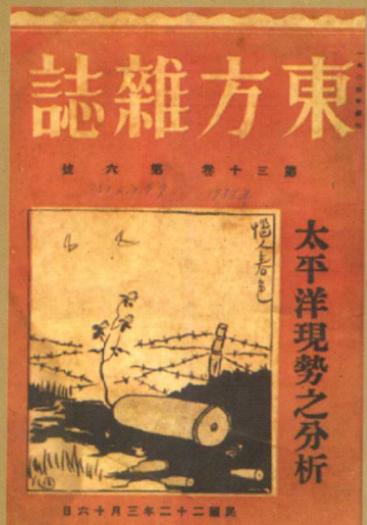
《南洋史地與華僑華人研究》一書，收集了我國已故的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華僑史專家李長傅先生的論文40篇，因大多為作者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所作，現審讀舊本，發現某些史料引文有誤，個別觀點欠妥。為尊重原稿原貌，均仍其舊，尚希明鑒。

暨南大學出版社編輯部



李長傅先生像





序（一）

1999年春，王貴民教授來電話轉達陳代光夫人李平女士（李長傅先生之女）的盛意，告知暨南大學決定編輯出版李長傅先生的《南洋史地論文集》，代光同志有關海上絲綢之路的幾篇論文也收錄其中。當時她正在上海搜編有關論著，要我為《論文集》寫一篇序。當前出版學術論著，尤其是個人學術論文集，實屬不易。而暨南大學承擔了此任務，李平女士為之奔走，努力促成出版落實，我不能不襄此盛事，予以承諾。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我曾與李長傅先生有過兩次訪談，這對我日後在西域、南海研究領域裡通過考察實踐所形成的中國歷史地理理論體系有很多幫助。但過去因牽涉很多方面的原因和關係，一直未能寫出，至今全不為人所知，這次再不寫，就沒有時間了。

20世紀50年代末，我因當時“任務帶學科”的需要，先後兩次訪問長傅先生，與之探討中國歷史地理的體系和研究領域等問題。第一次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建起歷史地理研究組後，下達了有關歷史邊界、邊疆研究的任務，并作為該組長期承擔的國家重要任務，保持不變。歷史地理組的建立是由當時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提出計劃，一開始就目的明確，即將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改建為現代科學的中國歷史地理學。所以邊界、邊疆歷史地理帶出傳統學科的改造成為當時的重要任務，有如重擔壓肩。我第一次就是為這一研究任務專訪李先生的。我知道他很早就注意西域研究，有如羅布泊變遷，他曾先後發表兩文，一是刊登在《新亞細亞》1935年的《羅布泊考》；二是《開封師範學院

學報》1957年6月刊出的《羅布淖爾的歷史地理問題》。我看到該文後，獲知他在開封師範學院任教，才專程去開封特訪。歷史地理學要作為現代科學，首先是要脫離長期為史學服務，作為其分支學科的附庸地位，而建設成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獨立學科。為此，其理論體系、研究領域、內容方法等，就都要符合現代需要。首先，必須包括陸疆與海疆研究，尤其當前就是它的主要任務。若按中國史籍傳統的地域名稱，前者廣義可總稱為西域，後者就是南海，但在傳統歷史地理或沿草地地理學中並不包括它們，或不去研究，因此這一領域過去長期為西方漢學家所占領。馮承鈞編譯法國漢學家研究論文集就稱為《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譜叢》（1~9編），便是按中國學術傳統用名。而國際漢學界則各立其名，多而分散，至今沒有統一。建設中國歷史地理學，首先要擴展研究範圍，進佔西域、南海兩個新領域，走中國自己的研究道路，這是擺在建設中國歷史地理學面前的第一個大問題。李先生既研究南海，也兼通西域，是我所知最合適的人，所以才決定去開封專訪。我向他講出：中國科學院設定歷史地理研究組就是要建設作為現代科學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地域必須包括西域與南海。西域的葱嶺以西部分和南海現今一部分屬外國，我們的研究只能是緊扣中國需要和有關部分，而不能研究其全部，不是作為外國史地而研究。既有區別，也有聯繫，如此就需要提出新的學科理論、研究領域、方法和內容等。我按當時需要擬出一套並不成熟的方案，原以為李先生研究南洋史地，會有異議，出乎意料的是，他非常真誠如實地說：我研究南洋，從地理教學與編地圖開始，是教書兼編輯職業，為謀生需要，後來志趣主要是在歷史地理。南洋受條件限制有三：一是一般不能實際考察；二是本地語言文字、圖書利用也有很多困難，三是歷史地名如不在本地居住，不能實地調查考察，不易落實。至於西域、南海列入歷史地理研究領域，他也完全贊同。但他以為新疆作為西域主

要地區，長期是中國領土，有條件去考察，所以主張西域研究可先於南海，并舉開封歷史地理研究為例，如果不在開封，就沒有好的研究條件，不能進行實地考察，就寫不出像《開封歷史地理》那樣的專著。歷史地理一是要實地考察，二是要利用考古資料。李先生寫羅布泊考，主要是利用外國人的考察資料，而自己不能親去考察，深感遺憾。因此，他反勸我先研究新疆，充分利用地理考察與考古發現，最為緊要。而南洋無此條件，這也是他志趣轉向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原因之一。所以他要我研究新疆，實地考察羅布泊變遷，他說自己雖寫過二文，但沒有此條件。李先生的這番話，是非常真誠如實的，令我至今記憶不忘。我原來研究南海立志在先，如他指教，因條件匱乏，不得不轉為以西域為重點，南海變居其後。從 70 年代起，我八赴新疆，六次考察綠洲，多方驗證，於 70 年代提出塔里木河水系變遷，與樓蘭荒廢，是為塔里木河下游由“小河”南徙終於喀拉庫順，成為最早的羅布泊，以及明清時期隨河水多少而終點南北變動不同的湖址的觀點。1979 年找到中日合拍絲綢之路電視片機會，我與彭加木、夏訓誠等徒步冒險考察樓蘭、羅布荒原，目的就是實現“任務帶學科”的要求，終於提出國際上還未形成的獨立的綠洲研究學科和綠洲學，為歷史地理學開闢新道路。指導研究生奚國金研究羅布泊變遷，為完成畢業論文，我們兩次環塔里木盆地考察，他終於在英蘇 - 阿拉干一帶發現清代死亡之都樓蘭城，成為惟一成功的一次，這是西域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發現。

20 世紀 50 年代晚期，竺可楨先生建議，由中國科學院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其中《歷史地圖集》的聯絡、組織等秘書處工作，最初科學院交給地理所歷史地理組，負責有關歷史地理部分編繪。我提出一份草目，幾次商討，並未完全確定、落實。但歷史地理組必須先行，所以我們最早上馬。其中歷代對外交通圖一直由我負責，這正是李先生最早要我研究的，為此我先

後投入 40 多年，直到現在。第二次我再訪李先生是因《國家歷史地圖集》任務，當然也要“任務帶學科”，這是當時的要求。《國家歷史地圖集》是以地圖形式，并附以文字形式，同為表達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兩種手段。歷代對外交通圖包括陸路與海路，海路就是南海，陸路主要是西域，但都限為中國歷史記載和直接活動地域。這更明確西域、南海必須作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而不是作為域外或外國歷史地理去編繪。當時西北史地之學，已不能適應西域研究的需要，南海則晚清才開始注意，而編繪歷代對外交通圖，城、國、路線地名必須先定位，必須將研究西域南海歷史地理作為專門問題來解決。另外南海大多地名都存有多種爭論，比之西域地名更難解決。如李先生所論釐婆今地，究為爪哇或為蘇門答臘，至今仍有二說，國際學術界亦難以定案。首先西域、南海城名、國名、族名都必須作為研究尖端，置於刀口，刀尖才能解決。而此僅為基礎，在此之上還要進行很多研究工作。總之，不論西域、南海，用盡中外可用成果，而不能迷信、墨守，兩者都必須創出中國自己新路，目的為解決中國所需，而不是為域外或外國服務，這是首先應確定的一條原則。同樣，傳統沿草地理限於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今新疆的西域綠洲王國建國大多在漢以前，全不見於漢史，而當地居民則時代愈早，愈以雅利安人占絕對優勢。西北干旱地區文明皆起源、發展於綠洲，與中亞同一體系，起源皆在史前，包括人民來源遷移，與文化影響、經濟交流等，和中原內地的關係是愈早愈少，愈為間接。歷史地理研究是必須從文明起源開始，當出現原始農業，就是文明起源的標誌。當前最大的文明起源問題就是中國文明與其人民來源。外來說，特別是來源於兩河流域的西來說，至今在國際上仍占很大優勢。而當前最新最大的西來說則是蒲立本 1966 年提出公元前 5000 年，原始漢語和“吐火羅語”同源同族，也就是漢族祖先都一同西來之說。別的學科可以不管，但這些都是

歷史地理問題，就不能不研究或置之不問。李先生 1937 年 4 月在《東方雜志》發表《中國文化起源於世界文化之新研究》，最早注意中國文化起源問題，所以我再次訪他，主要為《國家歷史地圖》任務，與歷史地理有關問題，也包括這一問題。歷史地理研究從文明起源起，既要研究中國文明起源、發展，也要研究文明的傳播、影響。按我的主張，還要考慮今後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及對亞洲、世界可能的影響與貢獻。中國西北干旱地區文明起源、發展於綠洲，而與中亞毗連，統稱西域，同屬綠洲文明體系，早期居民、族屬、語系來自中亞，與中原不同。東南亞當中國、南海印度洋與阿拉伯海交通之冲，早期為中國與印度文明交匯，而兼備兩種影響，中期又加入伊斯蘭文化，成為三種文化交匯處，晚期東南亞為華僑分佈最多之地，中國文化主要由華僑傳去，現華僑大都加入各居住國國籍，或為其國民一員，今後仍當繼續發展。已故國際史學大師湯因比在 1967 年出版的《世界文明綱要》中將文明發展分為四個中心時期（1）最早：兩河流域。（2）15 世紀後：西歐。（3）二戰後：美國。（4）今後：東亞中國。這屬於推測，主要是根據中國文明發展與傳播，和對東亞、東南亞影響，遠遠超過西亞兩河流域、北非埃及與南歐希臘、羅馬，南亞印度，它們的影響，連同其文明本身，早已消亡不存，惟獨中國至今不衰。湯因比的推斷是否正確，還要待今後驗證。我必須提出的是，湯因比作為一個外國學者，在研究世界文明未來發展時，特別關注今後的中國文明。作為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更要研究中國今後向何處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證明是一條失敗之路。“全盤西化論”也根本行不通。今後必須創出自己的新路，一是更新，二是創新，三是復興，一如歐洲文藝復興，最後要形成中國文明的復興，包括她的對外傳播、影響。而東南亞由華僑傳去的中國文明及其未來發展，和今後中國文明的復興，是有密切聯繫的，所以我們的歷史地理研究包括中國文明

對外傳播、影響，地域北包西域，南包南海，時間則從文明起源於原始農業開始，整個都是為創建現代科學，也包括中國歷史地理學今後發展的需要，以後在我多年承擔邊界、邊疆歷史地理研究與完成《國家歷史地圖集》的任務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

20世紀60年代初，我曾寫過一篇《論歷史地理學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文章（見《地理集刊》第七號，科學出版社，1964年，第1~17頁），內容包括歷史地理的研究對象、範圍、方向、任務作用、學科性質等。根據當時已有的研究實踐與現實需要，我提出了新學科的建設意見，許多是過去沒有提出過的，我斗膽如盤托出。但由於當時我負責的研究任務尚未公開，如何帶學科，開闢西域、南海兩個新研究領域，未便公開討論發表，所以長期放在心里。李平女士給我來信，提到我訪問長傅先生，已經過了四十多年，她還記得，要我寫序，當然是在歷史地理研究方面，她不一定知道具體討論內容，但我一直銘記於衷。原擬歷代對外交通圖任務完成後，再進行總結，但至今未完，因而未得寫出，多年夙願至今未償，耿耿於懷。這本《論文集》我只看了目錄，收選範圍是環繞南洋史地研究為重心，李先生研究的志趣和造詣後來逐漸轉到以歷史地理為要，不限於南洋史地，也涉及西域，和我研究很有關係。他也曾和我談過一些原因、過程。1945—1949年，我就讀浙江大學史地系，讀的是地學組，李先生有關論著最早就是在此時期拜讀的，多少獲知他由南洋地理而轉到歷史地理研究，與我後來由地理而走上歷史地理，特別是南海交通與港口的研究，是有一定聯繫的。1949年浙大畢業時，我寫了一篇《中國港市之發展》，蒙業師李春芬教授贊許，推薦在《地理學報》發表，對我是一大鼓勵。中國港市發展和南海交通不可分割，而歷史上與之對應往來的主要就是東南亞各港，所以李先生有關這方面的論著我都盡量找來參考，從而立志南海交通與港市研究在其他研究之先，由此才走上了歷史地理研究之路。

所以李先生志趣由南洋地理而轉上歷史地理研究道路，我頗能理解，因為我也是由地理而走上歷史地理研究的道路，最早由港市與南海交通開始，最後決定總結為《南海絲綢之路、貿易港與華人街》，這也是看了李先生的許多論著，對我研究有所啟發而提出的。我同他講過，認為可行，部分選收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拙著《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上部為西域，下部為南海，僅收三分之一，將分別出專集，有些成果最早就是受他兩次談論和論著的影響。

李長傳先生一生學識淵博，兼通西域、南海史地，著作等身，受人尊敬。回憶兩次拜訪李先生的經過，宛然如昨，欣然提筆，寫成此序，謹以此表示對李先生的深深懷念。中外交通，南洋與華僑是暨南大學研究傳統，南海絲綢之路起點又在廣州，西北史地之學興於清代，南洋或南海史地之學有待今日。暨南大學在這方面，既有研究傳統，也有雄厚基礎，前途無量，謹祝今後創造更大更多的成就。

此序是作為“開闢西域南海研究新領域，創建現代科學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總結而寫的，由於太長，且篇幅有限，先將要旨刊布，余另行發表，理應說明。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
英國劍橋大學 Clar Hall 研究生學院客座院士

黃盛璋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時年七十有七

序（二）

南洋是我國對東南亞地區（包括中南半島、馬來群島和南中國海及其毗連的海灣、海峽和島嶼）的習稱。這一地區位於亞、澳兩大洲之間，當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航路的要衝，也是歐、非兩大洲和東亞之間的交通要道，自古以來，即為東方和歐、非之間居民海道往來的通道。早在秦漢時期，我國的先民即曾到達今越南北部一帶。東晉時期，高僧法顯西遊印度歸來曾經航行南洋。明初鄭和西航西南亞和非洲東岸，也曾到達今爪哇及蘇門答臘等地。明、清以來我國閩粵一帶先民多前往南洋各地進行貿易交往，并有不少先民僑居各地，因而對我國的關係特別密切。在二十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代，即有約千萬華人僑居南洋各地，從事農工商業及各種文教事業。由於南洋交通地位重要，資源豐富，氣候炎熱，物產富饒，因而自十七世紀以來，即引起歐西殖民者的注視。在早期，西、葡、荷等國先後侵佔菲律賓及其他群島，繼而英、法二國佔有馬來亞、新加坡、緬甸及越南等地。在十九世紀末年，美國擊敗西班牙，進而據有菲律賓。在本世紀二戰時期，日本侵略者更強據今南洋全境。殆 1945 年，日帝戰敗，各國人民始奮起驅逐日寇，先後宣告獨立建國，因而南洋各國在近代的歷史階段中，都曾經歷了淪亡之痛，殖民地的痕跡，至今猶有殘余，而居住其地的我國僑裔，也不免同受其害，血汗之苦，實不堪歷數。

近二三百年來，我國閩粵沿海一帶的居民，由於國內生計艱困，多僑居南洋各地，他們篳路藍縷，開闢榛荒，曾艱辛創業，歷盡種種酸楚，如早在十八世紀初期的我國乾隆年間，在爪哇的

僑裔曾遭受到殖民者的殘酷迫害，血淚之痛，實史不絕書。清代末年，清政府也看到華裔的生活艱困，文化落後，而當地殖民者，又不可能為華裔盡教化之責，特於 1906 年（光緒三十二年）由當時的兩江總督端方倡議在南京開辦暨南學堂，招收南洋回國子弟就學，即今暨南大學創校之始。至 1927 年鄭洪年長校，改為大學，擴大規模，當時即考慮到南洋文教事業研究的重要性，同時創設南洋文化事業部，並聘請對南洋文教事業素有研究的劉士木、李長傅諸先生擔任主持及研究工作，並於次年創辦《南洋研究》雜誌，自 1928 年至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發生時止，先後出刊十卷共數十期。

我在 1927 年即入暨大高中部讀書，當時即看到校內出版的《南洋研究》雜誌，幾乎每期必讀，同時直至抗戰發生時止，曾收藏全套數十本雜誌，很可惜這些雜誌後來均在鄉間散失。在這些雜誌中，也常讀到李先生的文章。1933 年以後我在暨大附中教書，當時在上海從事地理教學工作的大中學教師和書局及輿地學社的編輯共同組織了一個《中華地學會》，李先生和我都是這個學會的負責人（李先生擔任編輯主任，我任干事即秘書）。這個學會的主要工作即編輯出版《地學季刊》，至 1937 年抗戰發生時止曾先後出刊了二卷共 8 期，由於此刊的編輯及出版工作，我和李先生常有接觸。當時他還擔任東方輿地學社的編輯主任。李先生在學術研究方面的工作至為踏實，對每一篇文章均鑽研頗深，每讀他的文章，都感到有充實的內容。他對地理學理論方面的探研常有嶄新的見解，他實是我國早期探研辯證唯物主義地理學觀點的先驅者之一。他對南洋史地方面的研究不僅範圍廣泛，常多新見，他為了吸收新的資料，曾二度留學日本，為了研究南洋各地的實況，曾於 1937 年抗戰前夕到南洋新加坡馬來亞、曼谷及西貢等地考察，他的治學精神，可稱一絲不苟，抗戰時期，我們都在上海及鄉間任教，他由於擔任的課務較多，曾於 1939 年介紹我到揚州中學的滬校教地理，當時我們曾共同編寫了一部

初中本國地理課本（共四冊，大東書局出版，1939年），我也曾以此書作為對學生施教的教材。抗戰勝利之後，他曾一度到臺灣新竹任教，並著有《臺灣》一書，建國以後，他去開封師院（今河南師大）任教，我則於1951年到華東師大任教，此後遠隔二地，不便訪晤，不意他早在1966年初即患病離世，至今思念，實無限淒傷。

李先生的賢婿陳代光先生，專攻歷史地理，他在1960年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分配到河南地理研究所工作，於1985年調至暨大歷史系任教。我於1979年在西安歷史地理學術會議始得拜識，由於李先生的關係，我們一見如故，以後承他惠贈李先生的遺著《禹貢釋地》以及他的《河南人口地理》等書，俱見他的學術基礎深厚踏實，頗有李先生的學風，不意他在1998年即英年早逝，深深傷痛。

李先生一生專攻史地，他的學業興趣頗為廣泛，對地理管理論，區域地理及歷史地理等方面均有深邃的研究。他早年特別對南洋史地方面鑽研至深，這些著作，不下五十多篇，雖多為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著述，實總結了南洋各國在過去殖民地時期以及早期的歷史地理概況，這些資料至今仍很有參考價值，由於二戰以來，過去資料頗多散失，不易搜集，今暨大出版社能予以匯編，對嘉惠後人對南洋史地及一般情況的研究當有很大幫助。書中所輯除大部分為李先生在《南洋研究》及其他有關刊物的著作選輯外，也有少數幾篇是陳代光先生的研究成果，當前我國和南洋各國的關係日益密切，交通往來日益頻繁，僑裔人數也日益增加，本書的出版將對今後南洋的研究起重要的作用。本年適值李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本書的出版，當更有紀念的意義。

褚紹唐

1999年11月於華東師大